

# 略论萧友梅的 爱国主义思想

□ 罗天全

(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四川成都 610021)

## 摘要:

萧友梅的爱国主义思想始终贯穿着他的整个音乐生涯,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提倡“建立中国的国民乐派”,终生实践着“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第二,创作了大量的爱国主义音乐作品,为“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思想而放声呐喊;第三,倡导在抗战中建设“精神上的国防”,身体力行地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大潮。

## 关键词:

萧友梅:爱国主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6)04-0030-05

萧友梅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社会活动家。他不仅在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音乐理论和音乐社会活动方面为我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且在他长达几十年的音乐生涯中,其爱国主义思想也表现得日益强烈。

本文拟从以下3个方面分别加以阐述。

## 一、殚精竭虑:终生实践着“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

萧友梅自20世纪初留学日本以来,就将“教育

救国”作为自己一生中的崇高理想,并在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朝着这个理想艰难地前行、奋进。其时,开办新式学校以提高国民素质、培养高尚情操、发展自由个性、造就时代新人、增强民族意识,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教育思想的核心,萧友梅也概莫能外。

由于萧友梅是一位音乐教育家,所以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又别具特色,将其具体落实到音乐教育、音乐创作中,则是提倡“改良旧乐”、“创作新乐”和“建立中国的国民乐派”。他在1937年6月撰写的《对于各地国乐团体之希望》一文中说:

音乐乃人群必需之艺术,欲使其急速发展,须赖

各地爱乐者多组织团体研究提倡;今吾国各地到处皆有国乐团体的成立,且团员中不乏天才之士,倘能时时借镜西方音乐,理论、技术两方面均作有系统的研究,将来改良旧乐创作新乐均非难事,甚望海内音乐同志多发愤努力,以期与西乐有并驾齐驱之一日也。

1938年2月1日,萧友梅在《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一文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与其说复兴中国旧乐,不如说改造中国音乐较为有趣。因为复兴旧乐不过是照旧法再来一下,说到改造,就要采取其精英,剔去其渣滓,并且用新形式表出之,所以一切技术与工具须用西方的,但必须保留其精神,方不至失去民族性。

“改良旧乐”、“创作新乐”,并不是萧友梅的最终目的。萧友梅为之奋斗的终生目标是要“建立中国的国民乐派”,这是他为我国新音乐事业勾画的宏伟蓝图。他在《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一文中说:

我以为我国作曲家不愿意投降于西乐时,必须创造出一种新作风,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与其他各民族音乐有分别的,方可以成为一个‘国民乐派’。但是吾国音乐空气远不如百年前的俄国,故是否在这个世纪内可以把这个乐派建造完成,全看吾国作曲家的意向与努力如何,方能决定。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萧友梅甚至在1939年6月撰写的《复兴国乐我见》一文中,为“中国的国民乐派”将要表现的“国乐”作了如下定义:

何为国乐?曰:能表现现代中国人应有之时代精神、思想与情感者,便是中国国乐。国乐之要点在于此种精神、思想与情感。

什么是现代中国人应有的“时代精神、思想与情感”呢?他在本文中又说:“现值抗战复兴时代,对于敌人如何敌忾同仇,对于政府应如何拥护,对于疆场壮士应如何振奋崇敬,对于受难同胞应如何爱护怜恤,凡此种种亦皆现代中国人应有之精神、思想与情绪也。须能将此种精神、思想与情绪表现于作品之

中,始能称为中国国乐。”“与中国之国运毫无关涉,……不配称为‘国乐’也。”

由此可见,萧友梅在国家存亡之际,以一个爱国者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对音乐的功能进行了重新审视,对“国乐”的概念也作出了相应的修正,这昭示着萧友梅在教育理念及教育方针上“精英教育”让位于“普及教育”的重大转变。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萧友梅的内心深处,他一生所追求的理想始终没有放弃:“他日世界音乐中,或尚能容吾国占一席之地乎!”

## 二、慷慨高歌:为“五·四”反帝反封建而放声呐喊

萧友梅于1906在日本经孙中山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初步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回国后,又于1912年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进一步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礼。在德国留学的7年,更是切身体会到资本主义制度较之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优越。萧友梅的民主革命思想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逐渐成熟起来的。

1920年3月,萧友梅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此时,他尚能感受到“五·四”热浪的余温。萧友梅在北京期间,他创作的音乐作品大多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特征。如:《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问》、《国土》、《中华好》、《华夏歌》、《渐渐秋深》、《南飞之雁语》、《五四纪念爱国歌》、《总理奉安哀辞》、《国耻》、《国民革命歌》、《国难歌》等歌曲,以及钢琴曲《哀悼引》和随后据此改编而成的军乐曲《哀悼进行曲》,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对萧友梅的强烈影响。

《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胡适词)作于1921年6月。作品以雄壮的旋律,歌颂了在辛亥革命中牺牲的烈士以及他们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他们不能咬文嚼字,他们不肯痛哭流涕,他们更不屑长吁

短叹! 他们的武器:炸弹! 炸弹! 他们的精神:干!  
干! 干!”

《问》(易韦斋词)作于 1922 年,收入在他同年出版的《今乐初集》中。作品通过对人生华年、秋声秋花、江山尘世的慷慨和发问,抒发了一种爱国忧时的感情,表现了一种苦闷彷徨的心理,“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作者在这里对山河破碎、军阀混战表现了强烈的不满。

《南飞之雁语》(易韦斋词)作于 1922 年,收入在他同年出版的《新歌初集》中。萧友梅和易韦斋都曾是他临时大总统府的秘书,如今他们虽然时时怀念危难中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但却苦于身处北京、远离广州,故只有遥望南天、借“雁语”而抒怀。作品曲折地表现了萧友梅对军阀统治的极度不满。

《五·四纪念爱国歌》(赵国均词)作于 1924 年,这首歌曲曾在北京青年会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而举办的“国民音乐大会”上由萧友梅亲自指挥合唱队演唱。作品以其高昂的旋律和强烈的节奏,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五·四”爱国运动及其伟大的革命精神。作者盛赞“五·四”青年“为民众而争正义”,“军警刀枪都不怕”的革命精神,以及为了“扫荡千古群魔毒”、“强权打破光明来”而誓将“爱国的血”、“自由的血”、“真理的血”及“和平的血”“洒遍东亚大陆地”的豪情壮志。

《总理奉安哀辞》则为纪念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于 1925 年 3 月 12 日病逝于北京而作。作品以悲哀的旋律、凝重的节奏,深切地表达了人民对领袖的无尽哀思。与此同时,萧友梅还将 1916 年在德国为纪念“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的主要军事将领黄兴、蔡锷相继逝世而创作的钢琴曲《哀悼引》改编成军乐曲《哀悼进行曲》,并于 3 月 19 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的公祭仪式上演奏。

1928 年 5 月 3 日,震惊世界的“济南惨案”发生后,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立即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萧友梅率上海国立音乐院的师生印发

了《国立音乐院特刊·革命与国耻》,创作了《国耻》(冯国文词)、《国民革命歌》(姚慎词)、《国难歌》(戴炳鑫词)等一批最早的反日爱国歌曲并将其发表在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的《音乐杂志》上。这些作品充分表现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尤其在《国耻》中对日本帝国主义“占我济南,杀我民众,阻我北伐,想将我我国灭”的企图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作品以雄壮的旋律、坚定的节奏,表现了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爱国精神:“奋斗! 牺牲战胜一切! 努力! 努力! 他们有犀利的枪炮,我们有鲜红的热血!”

萧友梅创作的这些音乐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唤起了人民大众的民主意识和反抗精神。在时代前进的洪流中,萧友梅始终如一地为他一贯所坚持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而放声呐喊、慷慨高歌。

### 三、激流勇进: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大潮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不但强占了东三省,更将其侵略魔掌伸向华北。同时,驻上海日军亦遥相呼应,“一·二八”淞沪抗战随即爆发。至此,上海已成为抗日的最前线。

在这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一切正常的教学、创作及演出活动都已变得遥不可及,萧友梅痛感昔日“精英教育”模式之“教育救国”的理想已断难实现。他遂于抗战全面爆发后建议政府:

一、提倡服务的音乐;二、提倡集团歌唱;三、提倡军乐队;四、实行音乐到民间去;五、实行音乐到军队里去;六、音乐人才普遍化;七、实用音乐人才巨量产生;八、音乐作品合时化;九、救亡作品巨量产生;十、从服务中建立中国的国民乐派;十一、跟随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获得中国音乐的出路。

总之,在这回大变动之后,民众和国家对于音乐的需求是格外的热烈,因为音乐是建设精神上的国

防的必需的工具。音乐教育应该迅速改变方针,以能适应目前伟大的需要为依归;以维系民众信念、团结全国人心、强调民族意识、激发爱国热忱等工作为己任,努力迈进。为国家应如是,为音乐本身,亦只有如是,才可希望找到那20年来无处寻觅的中国音乐的新生命。

为了“适应目前伟大的需要”,他大声疾呼:“在此国难期内,如环境许可时,应尽力创作爱国歌曲,训练军乐队队长及集团唱歌指挥,使他们在最短时期可以应用出去。”

如前所述,“改良旧乐”、“创作新乐”,从而“建立中国的国民乐派”,这是萧友梅矢志不渝、终生追求的目标。但经过20多年的“寻觅”,他终于痛切地反思:一个饱受战祸的贫穷国家、一个深受侵略的弱小民族要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是何等艰难?!因此,他将实现其理想的希望最终寄托在民族解放之宏图伟业上。“亦只有如是,才可希望找到那二十年来无处寻觅的中国音乐的新生命。”毫无疑问,这是萧友梅人生哲学的一大重要转变,也是他人生道路的长足进步!

萧友梅不仅如是说,而且如是做。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萧友梅立即支持上海国立音专的师生于9月23日迅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同时,他还带领师生们走上街头为东北义勇军募捐。在民族存亡的重要关头,萧友梅鼓励师生们“创作爱国歌曲,激励军民勇气”,并率先创作了抗日爱国歌曲《从军歌——为义勇军作》(骆风麟词)。

1933年,萧友梅组织国立音专师生赴杭州专场举行“鼓舞敌忾后援音乐会”。

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萧友梅积极支持上海国立音专师生参加声援活动并举行示威游行。

1936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弟弟近卫秀麿为表示中日亲善而给国立音专赠送了一台钢琴,但遭

到萧友梅的拒绝。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萧友梅为《音乐月刊》撰写了《发刊词》。他在文中指出:“必须注意如何利用音乐唤醒民族意识与加强民众爱国心”。同年冬天,他又在《十年来音乐界之成绩》一文中说:“音专出身的何士德、吕展青,胡然等及其他各校音乐科出身诸君纷纷组织歌队,有如春笋勃发不及计算。这真是最近音乐界一个最好的现象。”其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为“孤岛”。萧友梅不向日寇屈服,继续率领国立音专在法租界坚持办学。

1940年,尽管晚年的萧友梅贫病交加,但他仍严辞拒绝了汪伪政权的拉拢和利诱,充分显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人格魅力。

作为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军队连续惨败的目睹者,萧友梅的心中有太多感慨。因此,他于1937年12月14日上书国民政府,提出了建设“精神上的国防”的重要建议:

国防不单是有了飞机大炮便可成功,有了这些武器,还要靠忠心的壮士来使用它;而民族意识之醒觉,爱国热忱之造成,实为一切国防之先决条件。倘民众有必死之心,虽徒手,亦可与敌人周旋一两回合;若皆存苟安之念,有了飞机大炮,也还要拱手而让诸敌人。历史昭示我们,不只要建设一道坚固的物质上的国防,并且须建设一道看不见,摸不着,而牢不可破的精神上的国防;即民族意识与爱国热忱的养成。

萧友梅在这里把“民族意识之醒觉”和“爱国热忱的养成”称之为“精神上的国防”。他认为:精神上的国防“实为一切国防之先决条件”。而“音乐到底有什么贡献于非常时期呢?我们不妨具体地说:音乐是精神上的国防的建设者”,“是建设精神上的国防的必需的工具。”

萧友梅不是一个唯武器论者。他在这里不但看

到了诸如飞机大炮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的重要,也同样看到了开展广泛的政治动员等精神因素所将产生的雄浑的伟力。

非常遗憾的是,萧友梅曾寄予厚望的国民政府始终没有采纳他的这些建议,反倒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将他这些建议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

毛泽东于1938年在《论持久战》中曾发表过著名的论断: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大批祖国优秀儿女聚集在一起,他们以抗日救亡为己任,创作了难以数计的抗日救亡歌曲。这不正好构筑了萧友梅所极力推崇的“精神上的国防”吗?

此时的萧友梅已年届半百,体弱多病,手无缚鸡之力,他不能像广大青年学生那样英姿英发,奔走于大街小巷,出入于城镇山乡;他也不能像他所亲手培养的大批学生那样精力充沛、意气风发地奔赴抗日的战场;当然,他更不能像军人那样横刀跃马、驰骋疆场。

我们对历史人物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价。萧友梅就是萧友梅。他循着自己的人生轨迹,沿着自己的人生旅途,在崎岖不平的险径艰难地跋涉,奋力地前行。即使在国难之秋,他的心中也始终丢不下国立音专那众多的音乐学子;他的脑海还一直闪现着

“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尽管若隐若现、忽明忽暗——但他至死都在苦苦支撑着风雨飘摇中的国立音专。他以其自己独有的方式,身体力行、竭其所能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大潮,谱写了足以让世人无尽感慨的最后一个乐章。

责任编辑:李姝

#### 参考文献:

- [1]陈聆群,齐毓怡,戴鹏海.萧友梅音乐文集[C].萧友梅.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J].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
- [2]陈聆群,齐毓怡,戴鹏海.萧友梅音乐文集[C].萧友梅.十年来音乐界之成绩[J].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
- [3]陈聆群,齐毓怡,戴鹏海.萧友梅音乐文集[C].萧友梅.对于各地国乐团体之希望[J].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
- [4]陈聆群,齐毓怡,戴鹏海.萧友梅音乐文集[C].“音乐月刊”发刊词[J].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
- [5]陈聆群,齐毓怡,戴鹏海.萧友梅音乐文集[C].萧友梅.复兴国乐我见[J].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
- [6]萧友梅.乐歌社缘起[J].音乐杂志,2卷(5).
- [7]萧友梅.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队长养成班理由及办法[J].中国音乐学,2006,(2).
- [8]贺绿汀.萧友梅博士逝世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J].音乐艺术,1981(1).
- [9]周畅.中国现当代音乐家与作品[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 [10]梁茂春.中国近代专业音乐创作的开端[J].音乐艺术1981(1).
- [11]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参考资料(上)[C].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 [12]黄旭东.中国现代音乐史研究的重要新发现[J].中国音乐学,2006(2).
- [13]戴鹏海.事实胜于雄辩[J].中国音乐学,2006(2).
- [14]居其宏.萧友梅“精神国防”说解读[J].中国音乐学,2006(2).